

战略概念的拓展与国际战略学的创立

王明进

(北京外国语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 北京, 100089)

[摘要] 国际战略学是中国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一门新学科。国际战略学的创立是战略概念拓展的结果,是战略研究领域不断拓宽的结果,但同时又具有浓厚的中国背景,是一门在中国特殊的政治话语背景下产生的、带有独特东方特点的中国式学问。国际战略学在借鉴西方战略研究尤其是大战略研究的优秀成果时必须意识到相互之间在研究范畴、研究方法上的巨大差异,突出自己的特色,增加中国在国际政治研究领域的话语权。

[关键词] 大战略; 对外战略; 国际战略学; 战略研究

[中图分类号] D8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3489(2008)01-0001-06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中国国家利益的增进和维护强烈需要全球范围内的筹划。在此背景下,关于国际战略或大战略的讨论就成为中国国际政治学界讨论的一个热点。在这场讨论中,除了关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战略思想、关于国家对外战略实践阐释性探讨外,学术界还试图以战略学研究的基本理念、原则和方法为基础对国家的对外战略进行学理上的分析,构建一门新的学科即国际战略学。本文从战略概念的拓展入手,探讨国际战略学建立的知识背景和历史背景,认为这一具有中国话语背景的学科在发展中有其面临的困难,但也有其独特优势,其健康发展有待于国内国际政治学界的进一步努力。

一、战略概念的拓展

国际战略学的诞生是战略概念不断拓展的结

果。探讨战略概念演化的历史有助于我们把握国际战略的基本内涵以及国际战略学与其他学科的边界。根据人类战略思维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把战略概念的拓展过程分为如下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古典战略阶段。历史上,“战略”是一个与战争密切相关的概念。根据我国学者到目前为止的考证,在我国文献中最早使用“战略”这一词的是公元3世纪晋代司马彪所著的《战略》一书,“但战略思想、战略筹划和决策行动远在晋代之前就早有了”。^{[1](P9)}而国际公认的我国最早的战略理论家是孙子,其著作《孙子兵法》被公认为战略领域的经典著作。《孙子兵法》中的《计篇》所提的“庙算”指的就是最高决策者从道、天、地、将、法等方面进行综合考虑并进行决策,从而实现“王霸”政治目标的战略。在我国古代,战略、庙算、兵法都是用来指关于战争的谋划、组织及管理,直接和战争有关。

西方学者认为,西方对战略问题的研究最早可以从古希腊的修昔底德算起。^{[2](PXXI)}修昔底德在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中就提出了有关战略的问题。战略作为一个概念,一般认为始于公元6世纪末东罗马帝国皇帝摩莱斯为了教育其将领而写的“Strategikon”一书,这个书名的意思是“将军之道”。18世纪70年代,法国学者梅齐乐根据摩莱斯著作“Strategikon”创造了“Strategy”一词,并在其出版的《战争理论》一书中加以运用,才使西方古代的战略概念和观念得以流传。到了19世纪,随着战争规模的空前扩大,“战略”层次与“战术”层次分离,战略这一概念开始得到较严格的界定。克劳塞维茨在其著作《战争论》中认为:“战术是在战斗中使用军队的学问,战略是为了战争目的运用战斗的学问。”^{[3] (P 9-90)}若米尼将军指出,“战略是在战场上巧妙指挥大军的艺术,凡涉及整个战争区的问题,均属战略范畴。”^{[4] (P 104)}奥地利的卡尔大公认为,“战略拟定整个战争的计划,确定整个军事行动的进程。战略是最高统帅的科学。战术实现战略计划,是各级指挥员的艺术。”^{[5] (P 35)}“战略”终于在与“战术”的对比中形成了自己比较确定的内涵。

第二个阶段是现代战略阶段。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场现代化的战争。这场战争不同于以往的地方就在于它揭示了现代战争对国家的政治、经济、科技、外交、精神等军事以外诸领域的依赖关系。战争已不再是纯军事领域的局部性问题,而是涉及国家各个领域的全局性问题。鲁登道夫在1935年把这种战争称为“总体战”。^[6]总体战要求国家动员其所有力量来参与国际斗争,进行战争与和平的努力。这种巨大变化使得经典的战略定义无法继续适用于现代战争的筹划和指导。战争形态的变化要求战略思维把军事之外的因素考虑进去,总体战的思想正是反映了战略思维的这种发展。

这一时期另一位战略家法国人安德烈·博福尔也对战略思维的这种转变持肯定态度。他认为,战争将在所有领域内展开,包括政治、经济、外交、军事诸领域。同样,战略也必须是总体的。战略是两个对立意志使用力量解决其争执时所用的辩证法艺术。战略的目的就是对所能动用的资源作最好的利用,以达到政策所拟定的目标。战略思想是一种精

神过程,既是抽象的又是理性的,并且必须能够综合心理和物质这两方面的资料。^{[7] (P 1029-1156)}实际上,博福尔总体战的概念进一步脱离了战争艺术的军事领域,它清楚表明了国家在立足于民族国家为基本单元的国际体系中解决争执、赢得战争的思维方法和艺术。^[8]英国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利德尔·哈特在1929年出版的《历史上决定性的战争》一书中首次提出了“大战略”概念,并把“大战略”和“战略”区分开来。他指出:“正如战术是军事战略较低一级的运用一样,(军事)战略是‘大战略’在较低一级的运用”。^{[9] (P 25)}哈特指出,大战略的任务是调节和指导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的全部资源,以达到战争的政治目的。

战略思维的这些发展也反映在政府的政策里,1935年,英国军方首次采用了哈特关于大战略的概念,给大战略下的定义为:大战略“是最积极地运用国家全部力量的艺术。它包括运用外交、经济压力、与盟国缔结有利的条约、动员国家工业和分配现有的人力资源以及使用陆海空三军使之协调行动”。^{[9] (P 26)}大战略的提出表明,人类的“战略”思维又有了新的、较高层次的飞跃。

第三阶段是当代战略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而深远的变化和影响。东西方两大集团长期处于冷战状态,对立双方的竞争和较量逐步从军事对抗转向政治、经济、外交等更广阔的领域。在复杂多变的背景下,战略概念的内涵进一步从对战争全局的筹划和指导扩展到对国家全局及各领域的策划与指导。它的外延也从军事和战争领域扩展到经济建设、国家安全、科学技术、教育、对外交往等领域。战略的概念也开始多样化。战后初期,美国人也采取“大战略”这个概念,后来官方的正式军语改用“国家战略”,“大战略”在学术界仍然继续使用。与美国关系密切的一些国家多采取“国家战略”这一概念,但具体解释又有所不同。日本人称国家战略为“综合安全保障战略”,英国人仍然使用“大战略”这一概念,而法国人则使用“总体战略”概念,其他有关战略的词如“全球战略”、“世界战略”等也在使用。

从战略概念发展演变的过程来看,战略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扩展的基础是人类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引起战争方式的改变,反映了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最初,战略只是“将军之道”,是将军们取得一场战争甚至一个战役胜利的作战计划,反映了古代在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战争在时间、空间、参与程度的有限性。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民族国家的出现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确立,战争的规模越来越大,武器越来越先进,民族意识的兴起使战争成了全民族的事情,战略思维出现了飞跃性发展,战略所追求的目标中出现了政治方面的考虑,在战略手段上也开始考虑军事之外的手段,如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但最终目的仍是为了取得军事斗争的胜利,“大战略”概念的提出充分反映了这一发展趋势。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生产力的巨大发展,特别是人类对原子能的开发和利用,出现了威胁人类社会生存的核武器,核战争成为令全人类恐惧的噩梦,大国之间的较量由重点在军事领域转向了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综合国力较量,战略思想因此出现又一次重大发展,当前人们对战略概念的不同理解恰恰体现了现代国家之间的竞争是在空前广阔的范围中的竞争。

二、国际战略概念的提出及其内涵

国际战略概念的提出并非仅仅是“战略”的内涵和外延由纯军事领域向非军事领域扩展的结果,它还有着浓厚的中国背景。因此必须把这一概念放到中国特定的语境中来理解。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创造性地提出了极为丰富的战略和策略思想。在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一般只在军事领域使用“战略”概念,其最经典的论述是“研究带全局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是战略学的任务。研究带局部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是战役学和战术学的任务。”^{[10] (P175)} 在政治领域则仍沿用列宁使用的“策略”一词。毛泽东的名言“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其中既包含着党的政治战略,又包含着党的政

治策略。党的领导人还使用过“世界战略”的概念,例如,毛泽东在1940年评论苏联不加入反法西斯战争这一行动时使用过“无产阶级世界战略”这一概念。^{[11] (P286)} 刘少奇在1941年也使用了这一概念,他说:“共产主义事业,是一种全世界、全人类的事业。无产阶级的解放,需要全世界的统一行动与斗争。从苏联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就已开始了无产阶级在全世界的统一的战略新阶段。因此,世界各国共产党的战略,都不是离开其他各国而孤立的,而应服从统一的世界战略的利益。”^{[12] (P299)}

建国以后,我们党面临着更加广泛、更加重要的革命和建设任务,毛泽东也就把“战略”概念运用到政治和其他领域中来,并把战略和策略区分开来。例如1958年12月他在中央政治局武昌会议的讲话中指出:“从本质上看,从长期上看,从战略上看,必须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看成纸老虎。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战略思想。另一方面,它们又是活的、铁的、真的老虎,他们会吃人的。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策略思想和战术思想。”^{[13] (P807)} 在表达新中国的对外政策时,党的领导人采用了“国际战略”这一概念,例如1962年春,王稼祥针对当时对外关系全面恶化的严峻局面,主持撰写和审订了《关于我国人民团体在国际会议上对某些国际问题的公开提法》等文件报送中央,文件中把“争取建设社会主义的国际和平环境”称为“毛泽东同志一贯的国际战略思想”,指出“我国在对外政策方面,一向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根据毛泽东思想和他的国际战略,高举反帝的旗帜、和平的旗帜、团结的旗帜、革命的旗帜。”^{[14] (P46-47)}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工程师,邓小平发展了党的“国际战略”思想,并带领中国实现了国际战略的伟大转变。邓小平同志1979年3月30日在党的理论务虚会上讲话时指出,“现在可以看得更清楚,毛泽东同志在他晚年为我们制定的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关于中国站第三世界一边、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争取第二世界国家共同反霸,并且同美国、日本建立外交关系的决策,是多么英明,多么富有远见。这一国际战略原则,对于团结

世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改变世界政治力量对比,对于打破苏联霸权主义企图在国际上孤立我们的狂妄计划,改善我们的国际环境,提高我们的国际威望,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15] (P 160)}后来,邓小平同志又多次使用这一概念。

如前文所述,历史上党的领导人曾经使用过“世界战略”一词,那么为什么后来弃之不用反而使用国际战略这一词呢?这可能和中国对处理国家之间关系的基本原则、追求国家利益的方式的认识有着深刻的关系。

在中文中用来指代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总的谋划的时候,除了“国际战略”一词外,还有“世界战略”和“全球战略”等概念,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建国前也使用过“世界战略”,但建国后,早先提出的“世界战略”概念除了被用来指有关无产阶级世界利益的规划外,多被用来谴责美国以及后来的苏联在世界的称霸扩张,“全球战略”概念也多用于美苏两个在世界上有扩张能力和称霸野心的国家。^[16]因此,能够有资格使用这一概念的国家在世界上并不多,很难设想一些人口在几万甚至几十万的小国会提出“全球战略”或“世界战略”,而这些概念所包含的处理国际关系的霸权企图和自我中心主义的涵义也是我们所不赞同的。而“国际战略”这一概念很好地体现了国与国之间的平等关系,消除了自我中心主义。我们在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时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主张国家不分大小主权一律平等,反对霸权主义。发展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是任何一个国家必须面对的问题。国家和他国发生国际联系并不是追求一个霸权性的目标,很多小国和外界发生联系的地域范围也是有限的,它们更加重视区域内的、国家之间的联系。因此,国际战略这一概念体现了现代国际关系的主权平等原则,不仅适用于大国,也适用于广大中小国家。

国际战略是一个独特的中国概念,是中国对国际政治研究的一大贡献。根据国际战略这一概念诞生的历史背景及党和国家领导人特别是邓小平的有关论述和我国的外交实践,可以认为,国际战略是主权国家在较长时期内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的总体方

略,其主要表现形态是主权国家的对外战略。国际战略是主权国家对外战略的总和,在主权国家的战略体系中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在主权国家的战略体系中,国家战略或者国家总战略是国家的最高战略,是主权国家根据自己的国家定位和国家利益所确定的在一定时期内要实现的整体目标和达到该目标的手段和规划,既包括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也包括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的总体规划,而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的总体规划即国际战略。因此,国际战略是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战略体系中仅在国家战略之下,是第二层次的战略概念。尽管国际战略是由政府而不是由军队制订和组织实施的,但由于主权国家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是全方位的,必然也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军事、外交等方面。因此,国际战略又包括对外经济战略、对外文化战略、对外军事战略、外交战略等等。

三、国际战略学的创立

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国际战略思想和实践推动了相关研究的展开,也推动了国际战略学的诞生。一些学术研究机构相继成立,最早是1979年底在北京成立的中国国际战略学会,随后,北京国际战略问题学会、北京太平洋国际战略研究所等也得以成立。国际战略不仅成为中国的一个政治术语,也逐渐成为一个学术术语,尽管学术界也在使用“对外战略”、“外交战略”甚至“大战略”,但使用国际战略这一概念研究中国的对外战略构想特别是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外交思想已经成为一种典型的研究路径。

但中国学者并没有仅局限于把“国际战略”概念用于诠释党和国家领导人关于中国对外战略的基本原则、目标和手段等方面的论述及新中国的外交实践上,而是逐渐转向对国际战略一般理论问题进行学理性分析,在“国际战略”这一概念的基础上创建一门新的学科,把“国际战略”这一概念广泛用于一切国家关于对外政策的总谋划,使之成为一个普适性的概念,国际战略学便在中国诞生了。20世纪

80年代,我国把战略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专门学科,国际战略学作为战略学的一个门类,其发展更加有了学科依据。到90年代中期左右,比较完善和系统的国际战略学学科建设和理论体系逐步形成,学者们不再局限于为我国国际战略的制定提供背景材料和背景分析,或是论证我国既定的国际战略原则的对外政策的合理性和适应性,而是更多地将研究转向剧烈变动的世界政治中国际战略的一般理论问题。^{[17] (P 256)}国际战略学在中国诞生之后,还逐渐走进大学课堂。1984年,吉林大学的王家福教授开始在为吉林大学政治学和国际政治专业的硕士研究生讲授《国际战略学》使国际战略学走进了大学课堂。^{[18] (P 8)}随后,除国防大学等一些军事院校外,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等全国不少高校都为政治学和国际政治专业的学生开设了这一课程。因此,从国际战略概念的提出背景及其学术化努力的方向可以看出,国际战略学是一门地地道道的中国学问,是中国学者理解主权国家处理对外关系、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长远谋划的学术努力。

作为一门新的学科,国际战略学在创立和发展过程中也面临一定的困难。战略哲学的匮乏、科学性的相对欠缺、对规律性的东西挖掘不深、简单借用西方理论等等。^{[17] (P 279-285)}单就国际战略学研究而言,对西方相关理论的学习与借鉴尤为慎重。由于国际战略学科诞生的中国背景,所以在西方并不能找到完全对应的学科,如果硬要指出国际战略研究在西方对应的研究领域,则可能涵盖战略研究、大战略研究、安全研究以及对外政策分析等领域,其内涵远远大于西方主流战略或大战略研究。^[19]这种在学科基本范畴上的认识差异往往使中国学者在借鉴国外的研究成果时面临困境。例如,近几年在中国的国际政治学界出现了关于中国“大战略”的研究热潮,关于大战略的论著和论文不断出现,但由于思维传统的差别,我国学者所理解的大战略与西方所理解的大战略存在着明显的差别。我国多数学者把大战略理解为国家战略,在战略体系中处于最高位,是“总体战略、国家总战略、国家大战略”,^{[20] (P 1)}主张

“打破国内战略与国际战略之认为隔阂,达至国内战略与国际战略的总体协调”。^{[21] (P 41)}但在西方,大战略是一个外延远小于国家战略的概念,通常指的是国家总体战略中有关军事领域或国家安全领域的部分。中国学者与西方学者对大战略概念的理解上的差异导致双方在大战略研究领域交流面临尴尬。在中国,热衷于讨论大战略的人员多数是从事国际政治研究的高校教师、社科院的研究人员,而西方则主要是军事院校的教员或职业军人。

不可否认,西方的战略研究有其突出的优点。例如,西方的战略研究尽管也经历了随战略概念内涵的扩大而导致研究议程扩大的过程,但研究议程的扩大却产生了一种反作用力,即努力维护既有的学科边界的清晰、学科内容的系统完整和独特规定性,强调战略研究与政治分析的区别,避免被卷入政治的漩涡,继续把自己限定在狭窄的学科范围,体现出对学术研究范围清晰、研究对象精准的追求。^[19]又如,西方战略研究则更加重通过确凿的数据、严密的推理、可证伪的论证过程,揭示某一路径方法起效的程度与概率,主张道德立场的价值中立、方法论的科学主义以及理念上的理性主义和现实主义。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科学主义对西方的战略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可以被称为方法论上的革命,建立在数学演算基础之上的战略研究成果把严密的战略研究推理发展到了极致。尽管自科学主义兴起之日就受到了诸多批评,但鉴于“系统化的现代方法通常都能产生比较可以信赖的结果”,它对于许多种类问题的研究仍是“不可缺少”的。^{[22] (P 54-55)}

西方战略研究中这种对学科边界清晰性的追求、对研究方法科学性的推崇,都是值得中国学者在从事国际战略研究时应该学习的。作为一门具有中国话语背景的新兴学科,国际战略研究学科的确立首先必须要求其具有明确的研究范围,清晰的范畴和精确的概念。而在研究方法上,借用罗天虹在《论西方战略与安全研究的转变》一文中的说法,与西方因过于注重尖端的技术方法而损害研究质量的问题有所不同,我们的问题仍在于方法论的意识普遍较为淡薄,在方法的运用上较为粗糙,从而对研究

水平造成影响。我们的任务应该是,在全面认识科学方法的必要性与可能的缺陷的基础上,积极拓展对科学方法的运用;同时在与科学方法的碰撞中,进一步深化对经典方法精髓的把握,提升对经典方法的运用水平。^[19]但是,必须明白,国际战略学毕竟是

一门具有浓厚中国背景的学问,其研究范畴和西方的大战略研究有着显著的区别,对西方的学术成果生吞活剥,不注重与中国人的思维习惯、与国际战略学创立的学科背景相结合,只能对国际战略学的健康发展造成损害。

[参考文献]

- [1] 于汝波,刘庆.中国历代战略思想教程[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
- [2] John M Collins. Grand Strategy: Principles and Practices. Annapolis[M]. Maryland: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73
- [3] [德]克劳塞维茨.战争论[M].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4
- [4] [瑞士]A H 若米尼.战争艺术概论[M].刘聪.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6
- [5] [苏]米尔施泰因等.论资产阶级军事科学[M].黄良羽等.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5
- [6] [德]埃里希·鲁登道夫.总体战[M].戴耀先.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5
- [7] [法]博福尔.战略绪论[A]. [瑞士]A H 若米尼等.西方战略经典[C].范林森.北京:时事出版社,2002
- [8] 孙相东.战略概念的演变:从“战略”到“大战略”[J].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学报,2005(11).
- [9] 吴春秋.广义大战略[M].北京:时事出版社,1995
- [10] 毛泽东.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A].毛泽东选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11] 毛泽东.目前时局与党的政策[A].毛泽东文集(第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12] 刘少奇.反对党内各种不良倾向[A].刘少奇论党的建设[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
- [13] 毛泽东.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A].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 [14] 王稼祥.略谈对某些国际问题的看法[A].王稼祥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 [15] 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A].邓小平文选(第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16] 刘建平.国际战略与中国外交[J].当代中国史研究,2006(1).
- [17] 唐永胜,彭云.中国的国际战略研究[A].王逸舟.中国国际关系研究(1995—2005)[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 [18] 王家福,徐萍.国际战略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 [19] 罗天虹.论西方战略与安全研究的转变[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10).
- [20] 叶自成.中国大战略[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 [21] 门洪华.构建中国大战略的框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 [22] 纽先钟.战略研究[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责任编辑 齐琳)